

Readings in Global Jehol History
热河 / 承德历史文集译丛

ERNST BOERSCHMANN AND
THE RELIGIOUS
ARCHITECTURE IN JEHO

鲍希曼与 承德地区的 寺庙建筑

“热河 / 承德历史文集译丛”编委会

赵娟 编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Readings in Global Jehol History
热河 / 承德历史文集译丛

ERNST BOERSCHMANN AND
THE RELIGIOUS
ARCHITECTURE IN JEHOA

鲍希曼与 承德地区的 寺庙建筑

“热河 / 承德历史文集译丛” 编委会

赵娟 编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鲍希曼与承德地区的寺庙建筑 / 赵娟编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3

(热河/承德历史文集译丛 / 李雪涛, 刘文勤主编)

ISBN 978-7-5201-4277-9

I. ①鲍… II. ①赵… III. ①寺庙—宗教建筑—建筑
艺术—研究—承德 IV. ①TU-098.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28365号

· 热河/承德历史文集译丛 ·

鲍希曼与承德地区的寺庙建筑

编 译 / 赵 娟

出 版 人 / 谢寿光

责任编辑 / 史晓琳

文稿编辑 / 韩宜儒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国际出版分社(010) 59367142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 59367081 59367083

印 装 / 三河市龙林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3.5 字 数: 159千字

版 次 / 2019年3月第1版 2019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201-4277-9

定 价 / 79.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热河 / 承德历史文集译丛”编委会

主 任 刘文勤

副 主 任 李雪涛 王 学

编 委 (按姓氏拼音排序)

毕凤君 柴 山 高 蒿 关继高 郭靖涛 郭文利
顾 杭 李月明 刘建辉 柳若梅 栾志宏 马春玲
培高德 (Cord Eberspächer, 德国) 单化军
沈国威 宋 琦 孙 林 王凤才 王利华 信 祥
张 城 张子伊

主 编 李雪涛 刘文勤

编委会办公室 北京市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 马春玲 张子伊
政协承德市委员会 李月明 王凤才 郭文利 张 城

“热河 / 承德历史文集译丛”总序



1492年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 1451—1506)发现美洲大陆,六年后的1498年,达·伽马(Vasco da Gama, 1469—1524)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和太平洋水域,标志着世界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世界历史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一个半世纪后的1644年清军入关,此时全球历史的帷幕已经拉开,继葡萄牙、西班牙之后,荷兰也逐渐开始称霸世界。清朝从一开始就与世界建立了联系:顺治皇帝一直尊称耶稣会士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2—1666)为“玛法”。顺治帝临终议立嗣皇,也曾征求汤若望的意见,可见他们之间的亲密程度。^①康熙与白晋(Joachim Bouvet, 1656—1730)、张诚(Jean-François Gerbillon, 1654—1707)等国王数学家之间的关系更是密切,除了跟他们学习西学之外,也让王致诚(Jean Attiret, 1702—1768)、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 1688—1766)等到避暑山庄作画。清朝的皇帝从一开始就乐于与世界接触。

18世纪初康熙在热河修建热河行宫,标志着承德进入了一个

① [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冯承钧译,中华书局,1995,第174、177—178页。



新的发展时期。雍正元年（1723）设热河厅，十年后，雍正取“承受先祖德泽”之义，罢热河厅设承德直隶州，这是“承德”名称的来源。乾隆六年（1741），乾隆开始临幸避暑山庄，承德开始进入繁荣期。三百年来，承德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史见证，也是清代第二政治中心，特别是与边疆民族相关的很多事务都是在承德的避暑山庄处理的。乾隆年间诸如安置达什达瓦部（1744，1759），平定阿睦尔撒纳（1755），接见率领本部 17 万人东迁的渥巴锡（1771），会见率领甘丹、哲蚌、色拉三大寺堪布喇嘛前来祝寿的六世班禅喇嘛（1780），接受朝鲜的贺寿使团的朝觐（1780），接见马戛尔尼使团（1793）等等盛大的事件都发生在避暑山庄。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北京条约》和《天津条约》都是在避暑山庄获得咸丰皇帝的批准而签订的，咸丰后来也因企图重新扭转内外交困的被动局面而开启洋务运动。可惜的是，1861 年 31 岁的咸丰皇帝病死在避暑山庄。晚清至民国，无数国外的探险家、外交人士、传教士到过承德和热河地区。1933 年日本关东军占领承德，从而使得这一地区成为伪满洲国的一部分。这一阶段涌现了大量的有关承德的记录，除了文字方面的描述外，很多建筑学家、艺术史家、摄影爱好者也留下了数量众多的照片。

1793 年，马戛尔尼使团在承德觐见乾隆，之后提出了开埠、占地、减税、驻使等要求，特别是要求准许英国商人像俄国商人一样在北京设立货栈。乾隆认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①。按照西方的传统，《罗马法》根据“万民法”

① 见魏源《海国图志》（光绪平庆泾固道署重刊）卷七十七“乾隆五十八年敕谕后一道”。另见《上谕档》，转译自秦国经、高换婷《乾隆皇帝与马戛尔尼——英国首次遣使访华实录》，紫禁城出版社，1998，第 148 页。

的原则规定贸易是开放的: *Commercium iure gentium commune esse debet* (*Dig. 1, 1, 5*)。因此, 马戛尔尼理所当然地认为, 没有谁可以垄断贸易, 这也不是个别人的特权。实际上, 按照贡德·弗兰克 (Andre Gunder Frank, 1929—2005) 的观点, 18 世纪美洲白银的产量约为 7.4 万吨, 其中的 5.2 万吨 (占产量的 70%) 运往了欧洲, 而这 70% 中的 40%, 约 2 万吨运往了亚洲。另外留在美洲本土的白银约有 3000 吨经马尼拉运抵中国。按照他的计算, 如果加上日本和其他地区零星生产的白银, 全球白银产量的一半最终抵达亚洲, 尤其是中国和印度。^① 也就是说, 当时乾隆皇帝完全看不见的全球化经济之手, 已经在推动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的融合了。

多年前北京外国语大学提出: 如果说北外以往几十年的使命是将世界介绍给中国的话, 那么从现在开始北外的新使命是将中国介绍给世界。我们认为, 这两者并非对立, 而理应是同步进行的, 所谓“全球化”, 既包括“世界走向中国”, 也包括“中国走向世界”。中国应当不断地从世界文明中汲取养分, 即便是有关中国的学术研究, 也应当不断引进国外最新的研究成果。

面对 1990 年代以来不断引进海外汉学的各种理论的现状, 有学者不无担忧地提出: 一旦大规模地引进作为完整系统的汉学……它有可能直接触及和瓦解原有文明共同体的自我理解, 使国人在一系列悖反的影响中丧失自我认同的最后基础……一旦丧失阅读和思考的主动性, 陷入别人的话语场中而无力自拔, 就有可能被别人特有的问题意识所覆盖, 乃至从此难以名状自己的切身体验, 暴露出文

① [德] 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 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 刘北成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8, 第 6 页。



化分析的失语和学术洞察的失明。^①

实际上大可不必有这样的担心。即便你不知道，这些研究和理论依然存在。面对天主教和西洋历可能会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造成的巨大影响，杨光先（1597—1669）在涉及儒家名教方面的问题时，决不妥协，其言辞之激烈，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按照杨光先的逻辑，作为技术层面的中国历法如果失去地位的话，那么随之而来的将是“道”层面的天崩地裂。从杨光先所处历史时代的角度，我们当然可以设身处地地体会到知识分子在面对中国传统可能瓦解时痛苦而复杂的心态。但这并不意味着，传教士所传来的西方天文学知识就不存在，天圆地方的理论可以在中国一直传下去。

在德语中，“宗教批判”（Religionskritik）是康德的弟子蒂夫特伦克（Johann Heinrich Tieftrunk, 1760—1837）在康德思想的影响下，于1790年在《试论对宗教及所有宗教教义的批判》中提出的概念。^②蒂夫特伦克主张通过“宗教批判”来建立一个“符合理性的宗教”，反对宗教的“错误与狂热”。对于宗教而言，宗教批判是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动力，这一点在宗教史中一再被证明。任何一种宗教一旦成为唯我独尊者，就标志着其式微的开始。大部分有关宗教的重要理论建构都是面对攻击时的回应。明末的际明禅师在论述当时天主教对佛教的冲击时写道：

① 刘东：《阅读中国序》，见〔美〕何伟亚《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邓常春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2页。

② Johann Heinrich Tieftrunk, *Versuch einer Kritik der Religion und aller religiösen Dogmatik*, 1790.

若谓彼攻佛教，佛教实非彼所能破。且今时释子，有名无义者多，藉此外难以警悚之，未必非佛法之幸也。刀不磨不利，钟不击不鸣，三武灭僧而佛法益盛，山衲且拭目俟之矣！（《复钟振之居士书》）

际明是在收到钟始声（字振之，1599—1665）的《天学初征》一书后，在回信中提及自己的观点的。钟始声后来从憨山德清的弟子雪岭剃度，法号智旭，时人称之为“藕益智旭”，编有批判天主教的《辟邪集》（1643）。现代比较宗教学研究指出：任何一种宗教都不是真理大全本身，只有各宗教间相互论战、批判，才能使宗教自身得以不断完善。实际上，此类的批判绝不仅限于宗教。一个缺乏正常的批判的社会，也不可能健康地发展。

尽管海外人士对承德记载和研究的对象与中国学者相同，但透过他们的视角和方法，使得不论是作为传统资源的中国园林建筑，还是作为多民族帝国的史实，都得到了新的理论化阐释，从而产生了新观念、新思想。

对于有关中国的著作的译介，我们既要关注他者的视角、他者的理论，更要关注自我与他者的互动，以及由这种互动所产生的新成果。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自我身份的确定，一定是通过了解他者对自我的解读，才能得以实现。以《怀柔远人》（*Cherishing Men From Afar*, 1995）而名声大噪的美国历史学家何伟亚（James L. Hevia）对于所谓的“局内”和“局外”的划分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生在某一国并说那一国的语言并不意味着对当地之过去有着特许的（先天）接近能力”。生于斯长于斯的人要理解当地之过去“仍需转译和诠释，而两者都要求心通意会（empathy）与想象



力”^①。也就是说，所谓局内人与传统的天然联系，以及局外人与传统的“断裂”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种以往的想象而已。实际上，就文化的范围来看，他者是一种理想视角，因为只有在他者的眼中，异域文化才能更全面和彻底地展现，并且在他者与自我的对话基础之上能够更好地理解他者和自身。

海外承德研究使我们能够真正摆脱所谓的华夷之辨，超越汉族中心视角，即认为“先进”的汉文化同化了满蒙藏等其他“落后”族群的观点，从而用一种中心—边缘的比较视角，在广阔的相互关系情境中考察参与清代历史建构的几方之间的互动关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清代以来所形成的中国历史特殊性的一面。

据不完全统计，有关热河（承德）的记述和研究著作，仅日文的就有百余种，其他更是数不胜数。在西方世界，以承德为中心的清史研究的最新成果也不断涌现。早期的传教士、外交人士、探险家、记者纷纷来到承德，他们回去之后写了大量的东西，到目前为止翻译成中文的仅仅是很少的一部分。这些记载固然有一定的时代性、局限性，但无论如何这些有关承德不同时期的描述都是特别珍贵的历史文献。如果说清朝与之前的朝代有什么最大不同的话，可以说，清朝自始至终都与世界保持着联系。而承德在当时的中外关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正因如此，如果我们不了解世界的大背景，就很难解释清楚很多清代的问题，当然就更不会明白发生在承德的一些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了。

本套译丛选择了以往没有翻译的八部重要外文著作。

承德，在清代作为北京之外的第二政治中心，从异域的视角来

① 罗志田：《译序》，见〔美〕何伟亚《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邓常春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12页。

看待和研究又是怎样的？作为译丛的第一部，我们选编了《海外承德历史读本》，以期以他者的视角对承德历史有一个概览。

德国汉学家福兰阁（Otto Franke, 1863—1946）的《热河纪述》^①（《对直隶省热河地区的描述：中国风土人情的细致考察》），是一部研究承德历史的著作，也描述了作者 1890 年的热河之行以及 1896 年他对整个东蒙古地区的实地考察。德国建筑师鲍希曼（Ernst Boerschmann, 1873—1949）可以说是最早、且最为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国建筑的西方学者。在 1907 年 5 月至 6 月的三周时间里，鲍希曼对承德地区的建筑进行了极其细致的考察，拍摄图片图像近 240 张，绘制了一些建筑测绘图，并且制作、搜集了大量寺庙的碑石拓片。正是由于其在自己有关中国建筑的著作中所使用的照片、测绘图的专业性，使西方世界的读者渐渐以科学的方式来认知中国建筑。《图像与历史：鲍希曼与承德建筑的考察和研究》以鲍希曼的照片和测绘图为主，对照当时其他的一些照片，对鲍希曼的承德建筑研究做了总结。

1933 年日本侵占承德后，承德成为伪满洲国的一部分。之后东京大学教授、日本著名建筑史学者关野贞（1868—1935）率考察团队进入该地区，在关东军、驻“满”使领馆和满铁的支持下，对热河行宫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共拍摄了 2000 余幅照片。关野贞当时具体负责摄影和资料的搜集，他的助手竹岛卓一（1901—1992）和

① 1933 年王光祈在翻译海尼士（Erich Haenisch, 1880—1966）的文章中就介绍过这部专著：“对于地理一学，工作尚嫌太少……迄至今日止，计有两种模范工作，可以称述：一为佛郎克所著之《热河纪述》……”见海尼士著、王光祈译《近五十年来德国之汉学》，载李雪涛编《民国时期的德国汉学：文献与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第 28 页。



荒木清三（1884—1933）负责测绘，荒木曾经设计过北京的日本大使馆正门。之后出版了署名为关野贞和竹岛卓一的四卷本《热河》图集。^①由于作者是研究中国建筑史的著名学者，这部四卷本的图集对1930年代时期的承德建筑进行了非常细致的学术梳理。有些当时还存在的建筑，如清音阁、碧峰寺、珠源寺、罗汉堂等今已无存，所以这些照片更为珍贵。自1936年开始，五十岚牧太（1898—？）用了四年的时间在热河调查古建筑，同时也特别关注藏传佛教艺术，他于1942年出版了《热河古迹与西藏艺术》一书。^②这本书收录照片279幅，测绘图18幅。本书中的大部分照片由毕业于米泽工业专科学校的高桥正拍摄。

日本有关承德的文献非常丰富，我们委托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的刘建辉教授和宋琦女士为我们编译了包括关野贞、五十岚牧太著作在内的五种图书，从建筑史、艺术史、历史地理、旅行以及图像五个方面全面展示日本对承德的记载和研究。其中既包括日本学者有关承德的比较严肃的学术著作，也有一般性的介绍承德名胜古迹的图书和观光导游书，还有从政治角度宣传日军侵占承德的战争宣传品。这一切都需要我们以一种批判的眼光来对待。翻译这些著作并非目的，我们真正希望看到的是有关承德与清史研究的蓬勃开展。即便是日占时期有关承德一般性的介绍文字，对于今天的研究者了解当时的时代状况，依然是至关重要的历史文献。

以往有关海外承德历史著作的翻译，都是分散式进行的，或者是单本的图书，或者收录在其他的丛书之中。此次，北京外国语大学与政协承德市委员会尝试编辑“热河/承德历史文集译丛”，希望

① 《热河》图版4册本，文未刊，座右宝刊行会，1934（昭和九年）。

② 《热河古蹟と西藏藝術》，洪洋社，1942（昭和十七年）。

以此为契机系统译介迄今依然不为国内学术界所知的海外有关承德 / 热河的重要历史文献，让世界认识承德，让承德走向世界。第一辑我们于 2018—2019 年推出。虽然我们在挑选书稿时力求做到统筹兼顾，但受制于视野和学识的局限，难免会有疏漏之处，尚祈读者不吝指正。

李雪涛

2018 年 8 月 北京 / 承德

导 言



承德的避暑山庄和寺庙建筑建于康乾时期，是中国园林和建筑艺术的杰出代表。瑞典地理学家和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1865—1952）在 1932 年考察承德，见到普陀宗乘之庙时曾说道：“端庄凝重的规划设计、气宇轩昂的建筑群所体现出来的那份精致优雅，依然历经岁月的沧桑得以流转，这使我们不禁被这个宗教建筑惊呆了，她正从中国最后的辉煌时刻中款款而来。”^①事实上，这一描述似乎同样适用于整个避暑山庄及其附近的寺庙建筑，甚至也适用于比他更早一些造访这里的那些西方人，契合他们的所见与所感。

帝王行宫和皇家寺庙，对帝王而言是专属和特权，对普通人来说则是禁地。在晚清，能够进入、参观这一地区的外国人，必须是获得帝王恩准的人，也只能参观被允许参观的地方。英国马戛尔尼使华团 1793 年访问中国之时，乾隆皇帝在此接见了这批远道而来的欧洲人。不过，当时法国达盖尔（Louis-Jacques-Mandé Daguerre，

① [瑞典]斯文·赫定：《帝王之都——热河》，赵清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第 23 页。



1787—1851) 的摄影术还尚未发明出来, 因此那个时候带回欧洲的图像还只是各种形式的手绘作品, 当然, 还有文字的描述。其中对承德避暑山庄描述的几段文字常常被以各种方式引用或转述,^① 成为那个时候欧洲人对中国园林和建筑发挥想象力的重要材料。

1839 年, 摄影术发明了, 并且伴随着欧洲的殖民扩张传遍整个世界。正如有学者指出的, “摄影帮助考古学家精确记录殖民地的古迹”, 且 “服务于科学, 为 19 世纪的意识形态收集信息, 提供知识”。^② 从 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到 1911 年晚清帝国终结, 帝国的大门和深宅大院逐渐向世界敞开, 进入新近发明的照相机镜头之中, 成为世界观看中国的重要窗口, 也开启了中国视觉影像的全球大迁徙。以避暑山庄和喇嘛庙为代表的承德地区的建筑, 无疑成为近代西方人观察中国的重要对象。

与其他的园林和寺庙建筑容易进入有所不同, 承德的皇家属性使其在晚清帝国终结之前, 始终处于对外相对封闭的状态, 也一度是几位末日帝王在喧嚣动荡北京城外的安居之所。因此, 在早期西方镜头下的中国, 如约翰·汤姆逊 (John Thomas, 1837—1921) 和菲利斯·比特 (Felice Beato, 1832—1909) 的广为流传的中国影像之中, 鲜有承德避暑山庄和寺庙建筑的建筑影像。

1900 年义和团运动之后, 开始有许多西方人怀揣着各种不同目的趋之若鹜地进入承德地区, 游览、考察或收藏文物。本书辑录的文献和影像, 主要来自德国建筑师、汉学家、艺术史学者和建筑摄

① [英] 乔治·马夏尔尼、约翰·巴罗:《马夏尔尼使团使华观感》, 何高济、何毓宁译, 商务印书馆, 2013, 第 185—192 页。

② 何伯英:《旧日影像: 西方早期摄影与明信片上的中国》, 张关林译, 东方出版中心, 2008, 第 2 页。

影师鲍希曼 (Ernst Boerschmann, 1873—1949)。1902 年, 他作为德国东亚驻军成员经印度来到中国, 任期两年。在此期间, “中国建筑的结构和形式特征, 在艺术性上的尽善尽美, 以及与经验感知的纵深融合”, 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因而让他萌发了“有计划去研究中国建筑的念头”^①。1904 年回国之后, 在传教士兼东方学家达尔曼 (P. Joseph Dahlmann S. J, 1861—1930)^② 和政治家巴赫曼 (Karl Bachem, 1858—1945)^③ 等人的奔走支持下, 鲍希曼获得德意志政府资助, 赴中国进行建筑考察, 其主旨是考察中国的建筑艺术与宗教文化, 足迹遍及晚清十八行省中的十四个^④。

① Ernst Boerschmann, *Die Baukunst und religiöse Kultur der Chinesen. Einzeldarstellungen auf Grund eigener Aufnahmen während dreijähriger Reisen in China*. Band I: *P'u T'o Shan, die heilige Insel der Kuan Yin, der Göttin der Barmherzigkeit*, Berlin: Druck und Verlag von Georg Reimer, 1911, p. viii.

② 约瑟夫·达尔曼 (P. Joseph Dahlmann S. J, 1861—1930), 1878 年 9 月 30 日加入耶稣会, 先后在荷兰 Valkenburg 的 Ignatiuskolleg 和英国 Shropshire 的 Jesuiten-Collegium Ditton-Hall 学习天主教神学和哲学, 主攻语文学和比较语言学。1891—1893 年在维也纳大学学习东方学, 且深入学习梵语。1893—1900 年在柏林大学深造, 专业是印度考古学和中国文学, 获得博士学位。1902—1905 年参与了中国和印度的研究考察。按照 Papst Pius X 的意愿, 他成为耶稣会士派往日本的首位传教士。1908 年 10 月 18 日, 抵达横滨。1913 年他参与创立了东京的天主教私立大学, 即上智大学, 也就是今天的索菲亚大学 (Sophia-universität), 担任德国语言文学和印度哲学课程讲习工作。1914—1921 年担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 教授德语语言文学和古希腊语。

③ 巴赫曼是德国 (天主教) 中央党 (Deutsche Zentrumspartei) 的政治家和律师。中央党是德国中间派政党, 1870 年成立, 1933 年被纳粹党解散。1945 年重新成立。

④ 十八行省, 即内地十八省, 或者是关内十八省。大致是清代时汉族的主要居住区, 包括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河北 (直隶)、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晚清欧洲人创造了“中国本部” (China Proper) 的概念, 或称为“中国本土”, 西方世界用它来称呼有大量汉族人口聚居, 汉文化占统治地位的中国核心地带。



1907年5月15日至6月6日，鲍希曼在承德地区进行建筑考察，主要考察对象是寺庙建筑，尤其是寺庙之中的宝塔。

回国之后，鲍希曼连续出版了六本中国建筑研究的专著，其中包括《中国建筑艺术与宗教文化》三卷本《普陀山》（1911）、《祠堂》（1914）和《宝塔》（1931）^①，《中国建筑艺术与景观》（1923）^②，《中国建筑》（两卷本）（1925）^③和《中国建筑陶器》^④。1912年和1926年分别在德国的柏林普鲁士皇家工艺博物馆和法兰克福中国学社举办了“中国建筑”的专题展览，^⑤1931年完成了一部题为《中国》的纪录片底稿，发表中国文化和建筑相关的论文100余篇。^⑥

① Ernst Boerschmann, *Die Baukunst und religiöse Kultur der Chinesen. Einzeldarstellungen auf Grund eigener Aufnahmen während dreijähriger Reisen in China*. Band I: *P'u T'o Shan, die heilige Insel der Kuan Yin, der Göttin der Barmherzigkeit*, Berlin: Druck und Verlag von Georg Reimer, 1911, p. viii.

② Ernst Boerschmann, *Baukunst und Landschaft in China. Eine Reise durch zwölf Provinzen*, Berlin: Ernst Wasmuth, 1923.

③ Ernst Boerschmann, *Chinesische Architektur* (2 Bände), 340 Tafeln in Lichtdruck: 270 Tafeln mit 591 Bildern nach photographischen Vorlagen und 70 Tafeln nach Zeichnungen. 6 Farbentafeln und 39 Abbildungen im Text. Berlin: Ernst Wasmuth A-G, 1925.

④ Ernst Boerschmann, *Chinesische Baukeramik*, Berlin: Albert Lüdtke Verlag, 1927.

⑤ Ernst Boerschmann, *Chinesische Architektur*. Begleitwort zu der Sonder-Ausstellung chinesischer Architektur in Zeichnungen und Photographien nach Aufnahmen von Ernst Boerschmann, veranstaltet in den vorderen Ausstellungsräumen des Kgl. Kunstgewerbe-Museums zu Berlin vom 4. Juni bis 20. Juli 1912.

Chinesische Baukunst. Begleitwort zu der Sonder-Ausstellung: Chinesische Baukunst in Zeichnungen und Photographien nach Aufnahmen und aus der Sammlung von Ernst Boerschmann, veranstaltet in den Räumen des Frankfurter Kunstvereins in Frankfurt a.M. vom 24. Oktober bis 11. November 1926.

⑥ Hartmut Walravens, *“Und der Sumeru meines Dankes würde wachsen”: Beiträge zur ostasiatischen Kunstgeschichte in Deutschland (1896 ~ 1932)*, Wiesbaden: Harrassowitz, 2010.